

第 12 卷第 2 期 2019 年 10 月

Vol. 12, No. 2, October, 2019

国际高等教育

国际问题

学术期刊过量发表	47
全民知识生产	49
中美高等教育合作：一个关键的稳定因素.....	51

流动与国际化

不是父母辈的国际化：下一代的观点.....	53
以色列的国际学生流动.....	55
意大利：人才流失还是人才环流？	57

语言问题及英语的角色

欧洲的英语授课本科课程.....	59
韩国的混合国际化：是否有发展前景？	61
国家政策与英语在高等教育中的作用.....	64
马来西亚的国家语言政策和毕业生就业能力.....	66

聚焦日本

日本国际教师	68
日本和亚洲的国际预科证书课程.....	70
日本：为社会创新服务的世界一流大学.....	72

聚焦南非

南非大学近期的危机	74
南非的学生发展路径	77

学术期刊过量发表

Philip G. Altbach、Hans de Wit

Philip G. Altbach: 美国波士顿学院 (Boston College) 国际高等教育中心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科研教授、创始主任

电子邮箱: altbach@bc.edu

Hans de Wit: 美国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教授、主任

电子邮箱: dewitj@bc.edu

学术出版和全球知识分配系统存在着危机——顶级期刊面临的压力过大, 质量堪忧的书籍和文章数量太多, 掠夺性期刊不断增加, 世界各地的学者都面临着巨大的学术压力。《高等教育评论》(*The Review of Higher Education*) 这一受到高度尊重的学术期刊决定暂时停止接收投稿文章, 因为该杂志面临着积压了超过两年的等待评审或出版的文章, 此举引发了一场慌乱风潮, 并在学术界引起了关于学术出版未来的大量争论, 特别是有关于其必要的基础及匿名同行评审的争论。

这些基本问题是过去半个世纪全球高等教育中若干发展的遗留问题——特别是大众化及大学排名的出现。与此相关的是同构的社会学现象, 即大多数学术机构都希望与排行榜顶端的院校一样, 也就是说它们渴望成为研究密集型大学。最后, 博士生教育的发展趋势是免除传统的博士论文, 取而代之的是要求博士生根据其研究在学术期刊上发表多篇文章, 这实际上是将评估博士研究的责任从大学委员会转移到期刊编辑和审稿人身上。

功能失调和不必要的系统

我们的论点很简单。由于学术体系鼓励

不必要的论文发表, 因此发表的数量太多了, 需要大幅削减。减少学术文章和书籍的数量将使同行评审系统更有效地运作, 也可以削减或消除最近出现的掠夺性期刊和出版商, 并且可能最重要的是, 这可以消除那些担心论文发表而非教学和服务的学者的巨大压力。

在 Ernest L. Boyer 1990 年的著作《对学术的重新考虑: 教师职位的优先事宜》(*Scholarship Reconsidered: Priorities for the professoriate*) 中, 他认为对学术工作的评价应该包括学术职业责任的所有方面, 并且对绝大多数未就职于研究密集型大学的教授而言, 学校应就其教学和服务而非科研进行评估。他认为, 大多数学者需要及时了解各自领域的研究趋势和当前思想, 但不一定需要生产新的知识。当然, 那些希望进行研究和发表论文的非研究型大学的少数学者应被允许开展此类工作。

同时, 必须加强对教学的认可和尊重。必须消除院校和个体的同构——这绝非易事, 但绝不可能通过胡萝卜加大棒的组合来实现。大多数非研究密集型大学应在很大程度上专注于教学。教师应该因其良好的教学和对社会和工业界的服务而获得奖励, 而非期望他们从事基础研究。声称所有大学都有

研究使命的德国洪堡模型是在浪费资源，且无益于保持教育质量。应用科学大学和其他非研究型大学要求获得研究经费和授予博士学位课程的需求，以及政治家们的支持倾向，与这一趋势背道而驰。欧洲和其他地方的应用科学大学不断增多，但是这类学校不应具有科研功能，应坚持自己的品牌并专注于应用研究所支持的教学。专业博士学位是基于科研型博士学位的一条替代路径，它适用于那些不以科研为重点的人才。如果只是在研究型大学中进行细致的区分且要求研究发表物，我们的猜测是研发的质量将会提高，且目前所谓的研究文章数量会减少一半以上。

质量控制

为恢复出版系统的合理性，必须大量减少文章和书籍。我们不主张知识生产集中在富裕国家，但知识生产应主要集中在所有国家的研究型大学。已设立的期刊应更加关注观点、方法和主题的多样性。大多数著名出版物中的研究范式和科研领域的传统垄断需要通过更多来自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优质学者和作者的参与来打破，也需要通过性别和其他形式上的多样性来进行改变。

我们期待提高质量，但也呼吁质量由学术界来掌控，而非受制于非学术的排名机构、出版商、引用率和影响测量者。解决的方案不是需要更多质量较差的研究。质量，而非

数量，应该是我们的目标，我们要将对质量的控制权带回学术界，同时确保质量控制不受富裕国家研究型大学这一小团体的支配。

可能进行的改革

当然，第一步是确定学术系统的差异化使命，将学术机构置于适当的类别，并将财政拨款与使命联系起来。知识分配系统需要重大的改变。研究密集型大学和适当的专业协会、政府资助和其他机构需要对已经过度商业化和部分腐败的系统承担更多的责任和控制。掠夺性期刊和出版商需要被淘汰。许多垄断性的私营部门出版商（如 Elsevier 和 Springer）收取的敲诈价格需要降低。同行评审制度需要强化，该制度是维持科学研究和出版质量的核心。我们基本上认为出版系统已经失控，且在这一点上，我们处于一场深刻的危机之中，因为寻求发表的文章数量很多。文章数量已压倒了出版系统，因而导致了过度商业化和腐败。

我们解决问题的观点和建议是减少出版物的数量，而不是通过干扰学术自由或将权力集中在传统学术权力者的手中。我们的建议是，人们需要认识到全球大多数大学和学者都专注于教学，且绝大多数大学都认识到其专注于教学的重要角色，而非寻求成为研究密集型院校。

全民知识生产

Alma Maldonado-Maldonado、Jenny J. Lee

Alma Maldonado-Maldonado: 墨西哥国立理工学院研究和高级研究中心 (CINVESTAV) 教育研究系 (Departamento de Investigaciones Educativas, DIE) 研究员

电子邮件: almaldo2@gmail.com

Jenny J. Lee: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高等教育研究中心教授 (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Higher Education)、南非开普敦大学访问学者

电子邮箱: jennylee@email.arizona.edu

谁应该负责产出科研项目? 应该在哪里开展科研项目? 通过将知识创造的角色分配给在顶级院校 (由其在全球大学排名中的地位决定) 中就业的教师, 分层的高等教育体系得以延续, 同时却遏制了知识生产的参与。目前的系统在包容性和多样性方面已受到挑战。在知识被认为是消除世界不平等的关键因素的情况下, 在扩大高等教育参与的背景下保持全球垂直分化可能不是最佳策略。

限制科研地点时需要考虑两个主要相关后果。首先, 将科研功能分配给特定大学可能会影响知识产生者的多样性, 从而限制了所产生知识的广度。在各个国家, 这些院校的教师性别、种族和阶级方面的差异往往较小。其次, 将科研功能保留在任何一个国家的顶尖研究型大学中, 将不可避免地增加国家内部的分层。

已有大量研究 (包括来自非研究型大学的学者) 记录了属于少数民族和种族群体以及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个人在获得高等教育方面机会上的不利条件。事实上, 研究型大学也有最具选择性的录取程序, 这限制了社会流动, 有利于最高社会经济阶层的个人, 同时将少数族裔学生移交到资源较少的大学之中。这些人口统计学问题同样也适用于教师。

相反, 应该在各种类型的院校中促进科

研, 更加努力地加强并合法化本土知识, 从而使世界上尚未被充分研究的地区的学者成为全球对话的一部分。当生产知识的人更加多样化时, 扩展所提出问题类型的可能性、所使用的研究方法论也就更多, 同时, 研究方法、结果解读、甚至是新发现的可能性也会更多。国际合著的数量正在增加, 这一趋势是全球高等教育参与度增加的结果, 也是一些新兴经济体积极发挥其知识生产者角色的一种方式。

科研评估与传播

实际上, 出版物存在危机, 至少部分是出版压力促成的。相关问题包括同行评审中的西方偏见以及全球顶级期刊的主导地位。我们应在关于科研生产和出版物的更广泛讨论中考虑这两个背景因素。

来自顶尖大学的教师常受到评估机制的不断审查, 这些评估机制往往反映全球排名标准。大学希望这些教师能够在英文顶级期刊上发表文章 (英语可能不是他们的母语, 因此他们的文章可能无法在当地被人们阅读)。与当地背景更相关的研究可能不被视为具有较高“影响力”。这种被广泛接受但几乎没有受到质疑的“影响力”标准, 仅基于国际引用数量, 进一步有利于核心参与者, 却

边缘化其他期刊。大学需要重新定位评估系统，强调在向全球受众提供信息的同时，创造对当地环境至关重要的本土知识的重要性。

只有资金充足的大学、组织和个人才能获取顶级期刊中的出版物，这使世界大部分地区无法获得这些新知识并进一步降低其影响引文索引的能力。知识生产民主化并不能防止源于世界各地的出版物饱和、掠夺性期刊或抄袭与道德问题。然而，通过发送消息简单地要求停止发表文章，这些问题是无法解决的。相反，评估系统还应考虑本土语言的价值和更广泛的出版物发表渠道。

“学术资本主义”

当科研被商品化时，不平等的差距尤为明显。根据世界银行就 2017 年美国、巴西、阿根廷和智利（以美元统计的国际收支）支付和购买知识产权的数据，美国获利 790 亿美元，而巴西损失 45 亿美元，阿根廷损失 21 亿美元，智利损失 14 亿美元。这些数据表明了知识经济不平等的金融动态，并证明了知识生产对发展的重要性。知识产权消费导致创造较少知识的国家出现财政赤字。鉴于目前存在的这些不平等现象，维持相同的全球结构和相同的国家分层，特别是对于低产量的知识生产者而言，并非是解决问题的答案。

培养研究生

科研和教学不必相互排斥，在这些领域工作的教师并不总是在进行零和博弈。培养研究生在当前的知识社会中尤为重要。无论他们是否成为学者，今天的学生必须熟练掌握科研过程，以便认识到严谨的科研并理解

如何参与其中。鉴于全球学生因分层而难以进入顶级院校，知识创造应成为所有类型大学的核心教育内容。

科研能力建设

在当前的知识社会中，学生和学者，尤其是非研究型大学的学生和学者，应该学习如何成为积极的知识贡献者，而不仅是消费者。特别是在科研生产方面落后的低收入国家，应将科研和教学整合到能力建设之中。

建设知识生产能力的可行战略包括增加科研资金投入并监督科研资金使用、创立声誉良好的出版物和监测掠夺性期刊，以及就差异对学生（本科生和研究生）进行教育，并为本土和国际群体提供信息的科研项目进行奖励。

结语

总之，如果就院校类型和教师群体在开展科研活动上进行限制的话，全球知识生产将会严重受损。此外，简单的处理方案无法解决复杂问题，并可能带来更为严峻的挑战。该信息不能阻止特定类型的大学或教师进行研究。这种功利主义方法的问题在于它们不会改变现状，反而有助于证明文化霸权的合理性。减少科研出版物的数量可能会削弱掠夺性出版商的市场，并可能解决某些形式的腐败问题，但也会限制边缘化群体的参与。科研、教学和服务的未来是创新、跨学科和无国界的。将科研限制在限制精英大学之中不会改变当前的全球秩序。目前，知识与财富密不可分；只有当我们开始改变这种秩序的动态时，我们才能开始减少国家内部与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差距。

中美高等教育合作：一个关键的稳定因素

Gerard A. Postiglione、Denis Simon

Gerard A. Postiglione: 中国香港大学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亚洲高等教育研究联合会 (the Consortium of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in Asia) 名誉教授、协调员

电子邮箱: gerry.hku@gmail.com

Denis Simon: 中国杜克昆山大学 (Duke Kunshan University) 执行副校长、美国杜克大学福库商学院 (Fuqua School of Business) 教授

电子邮箱: denis.simon@duke.edu

20 世纪 70 年代末, 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 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坚持认为, 中国应该拥有“一千名才华横溢的科学家”, 这些科学家将得到全世界的认可。通过“大力度宣传对更多合格科学家和工程师的需求”, 邓小平希望快速批准派遣数百名中国人到美国顶尖大学学习。在过去的 40 年里, 即便面临着经济、政治和军事问题的周期性压力, 中美外交关系仍稳步发展。在经济和金融上渐增的相互依存以及精细调整的治国方法确保了冷静头脑在压力时期占上风, 因此, 在过去几十年中, 各领域的合作似乎不断扩大。

再看“千人计划”

不幸的是, 那些相对平静和充满远见的日子可能会突然结束, 这要归功于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 阿里巴巴的马云说, “如果非常不幸的话, 这可能会持续 20 年。”并且, 有迹象表明, 四十年来中美双方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合作可能首次出现严重冲击。即便是最乐观的观察者也必须承认, 我们已进入了一个“困难时期”。中国的“千人计划”(Thousand Talents Program) 可能是第一个目标, 在该计划开展的 10 年中, 约有 7 000 名顶级科学家和研究人员回到中国,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自美国。该战略计划现在被美国国家情报委

员会 (the US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视为将敏感技术从美国转移到中国的潜在手段。中国认为这是美国在限制中国崛起的努力, 特别是它在科学技术、商业和制造方面的进步。美国特别关注的是中国的“中国制造 2025”计划 (Made in China 2025), 该计划旨在将中国推向世界顶级技术领导者的行列。美国家喻户晓的新闻节目“60 分钟”(60 Minutes) 揭示了对在美国工作的中国学者的积极调查, 这对其职业带来了永久性伤害。美国大学可能不会解雇“千人计划”学者, 但该计划可能会影响美国各大学的联邦资助。中国坚持认为“千人计划”旨在招募世界一流的科学家, 而不是获得关键的美国工业技术。

经过几十年来中美学术交流中的良好意愿, 特朗普政府似乎急于在整个协作关系网络上施加阻碍。5 月, 特朗普政府宣布, STEM (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 相关领域的中国研究生的签证有效期仅为一年, 特别是在机器人、航空和高科技制造领域的学生签证。在美国的许多中国学者开始觉得他们受到怀疑。美国国会图书馆中国分部前负责人 Chi Wang 在美国政府工作了 50 年, 他表示, 这种情绪对美籍华人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澳大利亚、加拿大、欧盟、以色列和俄罗斯的红利

可能会有更多中国学者前往欧洲大学而非美国。美国退出多项多边协议，包括亚洲的贸易协定，这为中国带来了机会——中国通过其“一带一路”倡议变得更加对外开放了，该计划设计60多个国家。中国显然愿意利用美国留下的空间。所谓的“后美国”世界可能会为扩大欧洲与中国的高等教育和科研合作开辟重要的新机遇。

真正令人担心的是，北京和华盛顿之间正在进行的贸易战可能会减缓中美之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就在中国的科技进步为美国合作伙伴带来越来越多好处的时候。虽然这种放缓可能会影响中国的科技雄心，因为它正努力从制造业转向创新型经济，但中国人可能会转向新的合作伙伴，如以色列和俄罗斯，欧盟、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虽然美国的行动可能会增加中国人的焦虑，但我们必须记住，中国的领导者有足够的耐心和坚定的决心；他们将适应并找到加强美国以外的大学合作伙伴关系的方法。美国政府对留学生和学者的敌对政策可能会为特朗普政府制定良好的选举战略，但它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解决几乎所有重大的全球问题都需要进行某种形式的密切中美磋商和合作。

重新调整复原力和持续合作

幸运的是，在中国的大多数美国大学分校或其他合作项目都没有遇到严重困难。美国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与人民大学在工业和劳动关系领域的关系是个例外；

由于围绕学术自由的问题，康奈尔大学决定退出这种关系。在最近由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the China Education Assoc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和昆山杜克大学共同主办的北京论坛上，人们认识到中、美在中国的高等教育合作仍然相当稳定且充满活力。美国大学在中国的分校所办法的学位仍然在美国获得认证。

2017年9月27日，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举行的美中大学校长论坛上，亨利·基辛格（他是1979年促成美中关系正常化的创造者）表示，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积极关系的唯一替代方案是全球性混乱。在那次会议上，中国的时任副总理刘延东表示，中美两国应加强人文交流，建立更强大的关系，在此基础上，两国分歧最小，共识最多。随着中国大学努力争取世界一流地位，中美大学年度国际排名的竞争可能会更加激烈，但与强大的双边大学关系对解决全球问题和维护地缘政治稳定的意义相比，这种竞争相形见绌。在特朗普之前，中美关系显然更具弹性和活力。两国可以围绕关键问题开展战略性和前瞻性对话，实现互利共赢。目前，这两个国家的大学可能无法消除现在引起特朗普和习近平政府关注的贸易扭曲和对抗，但大学可以做很多工作来保持美中关系的平衡。因为这种关系正在自行重新配置，以更好地反映当前的政治和经济现实。来自两国的学生最终将成为政府、商业和学术界的未来领导者；充满希望的是，通过合作学习和跨文化交流增进相互了解将有助于缓解目前的一些不信任，并为未来几年更理性和平衡的对话铺平道路。

不是父母辈的国际化：下一代的观点

Laura E. Rumbley、Douglas Proctor

Laura E. Rumbley：美国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副主任

电子邮箱：rumbley@bc.edu

Douglas Proctor：爱尔兰都柏林大学（University College Dublin）国际事务部主任

电子邮箱：douglas.proctor@ucd.ie

高等教育国际化通常被认为是一种“青年”现象——作为探究领域、专业实践领域和高等教育机构的战略事业。即便如此，今天仍有大量关于这一主题的出版物以及公认的专家，他们的工作以深刻和持久的方式塑造了这一领域。在提出和定义关键术语、搭建概念框架、形成相关辩论、吸引众多利益相关者的注意力并将理论与政策和实践联系起来等方面，国际化研究的当代“创始人”做出了贡献。

国际化的知识发展紧随世界各地组织群体的发展，这些组织致力于通过编程、知识开发和/或为该领域工作人员提供的专业培训来服务国际教育。其中一些组织已有几十年历史，其中包括：美国国际教育学院（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该学院于 2019 年庆祝其成立 100 周年；成立于 1925 年的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the German Academic Exchange Service, DAAD）；于 1948 年在美国成立国际教育者协会（Association of International Educators, NAFSA）；成立于 1989 年、总部位于荷兰的欧洲国际教育协会（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这些实体以及在世界各地的国家、（亚）区域和大陆（内）运作的众多相关组织和协会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国际教育的大部分对话和行动议程。事实上，国际教育领域的创始学者和组织在决定我们如何理解和

制定全球高等教育国际化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承认过去所提供的效用和“包袱”，同时当我们反思我们来自哪里以及我们前进的方向时，出现了重要的问题，因为我们在 21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结束时受到冲击：“下一代”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看法如何以及以何种方式引导我们走向未来？为什么创新（在信息来源和内容方面）都很重要？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全球高等教育格局日益复杂，国际化动态的快速演变，以及与全球背景下高等教育和人力资本发展质量相关的高风险使得（重新）关注有关新模式、新环境和新主题的国际化对话至关重要。如果我们认真地理解和应对未来的可能性和挑战，那么通过收集来自世界各地的新声音以考虑这些问题也是至关重要的。

新模式、新环境和新主题

以前对各种数据来源的探索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高等教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少数（富裕的、且主要是以英语为主导）国家的研究中心。此外，专门针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研究成果也同样聚集在一起，不成比例地来自澳大利亚、欧洲和北美。某些主题在我们的随手翻阅的文献中数量过多，从美国留学经历到国际学生适应过程，以及单一的课程项目或院校案例研究分析。从字面上看，

与国际化现象相关的维度世界仍未得到很好的研究或是被完全忽视。

为纠正这种情况，主要的利益相关者必须致力于探索新模式、新主题和国际化的新环境。这些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和政策组织，它们构建探索路线以探索和资助研究；资深研究人员能够确定其持续获得新知识的个人议程，并影响他们网络中的同伴；研究生和青年学者书写初始阶段的论文、学位论文并开展早期博士后项目，导师们指导这些青年科研人员。

新环境：通往“何处”

国际化显然是一种波及整个世界的现象，但大部分研究仍是由北半球的英语国家产出和关注的。因此，国际化的新环境包括世界各国和地区，各种机构以及迄今为止鲜有人关注的其他环境。我们熟悉的与新环境相关的研究实例包括侧重于偏远的地理位置和/或高度边缘化的社区（例如，由于非广泛使用的语言占主导地位，或者普遍存在不安全性或文化隔离），或在极端经济危机或剥夺的情况下。就本土化活动、气候恶劣地区、偏远的乡村或荒野环境而言，我们对有争议的边境地区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有何了解呢？我们知道有几位正在深入研究这些主题的青年研究人员，他们需要得到鼓励。

新话题：研究“什么”

鉴于我们生活的复杂和充满活力的世界，国际化的新主题应该每天都进入我们的集体知识库。我们兴奋地注意到一些早期的青年的研究人员正在研究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如何服务于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多应对被迫迁

移问题的群体。其他人正在帮助我们学习在不同背景下初等和中等教育机构所采取的国际行动，并思考国际化如何与世界各地个人身份、国家身份和区域参与的形成相联系。还有一些人正在探索如何利用国际化的方法来培训未来的学者或推进大学学院和教育学院的工作。人们迫切需要关注与国际化有关的新主题；并且，对我们周围的环境进行更广泛的探索也需要持续的关注和支持。

新方法：“怎么”做

研究国际化的新方法促使我们共同关注如何在这一领域构建知识基础。我们熟悉的一些青年研究人员的工作使我们能够深入了解以下内容：从挖掘现有数据集的可能性以便更深入地了解国际流动学生的选择及其满意度的动态变化；到主题建模的潜力，以便了解在不同国家背景下关注国际化的广泛政府政策和倡议；再到西方国际化理论对基于新教根源的哲学和历史考虑。从生物过程到叙事分析，探索国际化现象的方法可以在一系列重要的方向上进行，这些方向应随着时间的推移提供相应的见解与观点。

愿下一代人前途光明

国际化未知的前途为下一代学者和学术实践者提供了机遇和挑战，他们致力于确保在未来几十年中，国际参与和全球学习在推进高质量和公平教育、知识发展和社会相关性方面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新一代国际化专家的工作具有实现这些目标的巨大潜力，在已有基础上，他们将用创造性的方法动态构建新的知识体系。

以色列的国际学生流动

Annette Bamberger

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 (Institute of Education,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博士研究生

电子邮箱: a.bamberger.14@ucl.ac.uk

在科研方面, 以色列大学拥有的国际资助、成果发表和引文排名令人印象深刻; 然而, 就接收国际学生而言, 以色列的表现仍然较差: 经合组织的平均比例为 9%, 而以色列只有 1.4% 的学生来自国外。这引起了以色列高等教育委员会 (the Council for Higher Education) 的注意, 这是该国负责协调高等教育系统的中央机构, 其资助部门是规划和预算委员会 (the Planning and Budgeting Committee)。在 2017 年 7 月宣布的一项新的多年计划中, 国际化被确定为一个重点, 目标是在五年内将国际学生人数翻一番, 达到 2.5 万人。

历史发展与当代问题

虽然建国前以色列大学的第一批学生主要来自东欧, 但建国之后的前几十年以来, 以色列大学的大多数学生来自当地。由于巴以冲突, 以色列的区域学生流动几乎不存在。然而, 国际学生并没有被忽视。从 1955 年开始, 由于大学、政府和侨民社区组织之间的协调, 以色列开始发展针对美国犹太学生在国外就读本科第三个学年/学期的国际学生课程。除学术成分 (强调希伯来语、犹太研究、以色列研究和中东研究)、文化和社会活动, 全国各地的旅行以及与当地以色列人的接触也是这些项目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由于这些课程的教学语言主要是英语, 学生需要专门的支持 (针对签证、住宿等), 因此, 以

色列逐步开发了为这些课程和学生提供服务的独立基础设施。虽然这些项目向所有人开放, 且欢迎来自不同背景的国际学生, 但這些项目主要针对犹太人——营销和招生、资金、支持服务、正式和非正式课程都证明了这一点。

现在, 院校的国际课程已扩展到包括短期课程、暑期课程和本科、研究生和博士水平的学位授予课程。就读于本科、硕士 (教学型) 项目国际学位生仍以犹太人为主。虽然这些学生支付的学费可以视为某些院校的收入来源, 但州、非营利组织和犹太侨民组织为学生提供经济支持, 着眼于促进全世界的团结、犹太身份和以色列—侨民关系。

在过去, 以色列吸引了大量美国留学生参与这些项目; 在 1996 年的《门户开放》 (Open Doors) 报告中, 以色列是美国学生出国留学的第八大热门目的地, 在以色列学习的学生人数 (2 621 人) 几乎与在南美洲 (2 683) 学习的人数相同。然而, 随着国际学生流动的迅速增加, 以色列失去了这一地位; 在 2017 年, 以色列榜上无名, 仅有 2 435 名美国学生选择到以色列留学。人数的减少有多种原因, 包括动荡的局势。但显然以色列未能保持其在美国的竞争地位。

除国际项目中的传统犹太学生外, 以色列还促进了学生流动的交流和伙伴关系, 特别是针对具有战略经济和政治重要性的国家。以色列在 2008 年开设国家 Tempus 办公

室，此后随着“伊拉斯谟+”（Erasmus+）计划的扩展，欧洲学生涌入以色列校园；在2015~2017年，“伊拉斯谟+”计划将来自欧盟的2471名学生和工作人员带到了以色列。此外，自2012年以来，政府采取了重大举措，与中国和印度建立了更密切的合作关系，包括赞助中国和印度的研究生（研究型硕士、博士和博士后），这类学术合作形成了伙伴关系的基础。

高等教育委员会新的多年计划以这些模式为基础，旨在扩大两类国际学生的入学率：

- （1）优秀的研究生，特别关注中国和印度；
- （2）优秀的犹太学生，特别是来自美国和加拿大的学生。

来自高等教育委员会的政策文件和报告揭示了这些新政策背后的驱动因素：以色列希望与这些国家建立密切的经济和政治关系，同时加强其高等教育机构的学术水平及其研发能力，以便在“全球知识经济”中竞争。尽管存在持续的冲突，但仍然缺乏建立和平和跨文化理解的动机。总的结果是，以色列的国际化政策包含两个不同的方面：一是研究生，特别是来自以色列希望改善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国家；二是来自犹太侨民群体的学生，这与犹太家园的国家身份有关。这反映在2016年最新的高等教育委员会统计数据中，这些数据总体显示，以色列的犹太学生（5370人）比非犹太学生（4700人）略多，这是研究和非研究课程之间的明显区别。研究生（研究型硕士、博士和博士

后）主要是非犹太人，而犹太学生主要就读于非研究课程（出国留学、学士、教学型硕士）。

挑战

在目前的计划中，一些问题得不到足够的重视，例如针对国际学生的历史基础设施，以及吸引和支持不同类型的学生的潜在挑战，而且几乎没有关于如何应对这两个问题的指导方案。这两类目标群体——具有不同的参考标准以及与该国的个人、种族和宗教的不同联系——将对试图吸引、容纳和支持这两个群体的以色列大学构成挑战。基于院校使命，有证据表明一些大学正在关注其中一类群体。

根据高等教育委员会在2016年的报告，魏茨曼科学研究所（the Weizmann Institute of Science，一个研究院）的犹太学生比例最低，而赫兹利亚跨学科研究中心（IDC Herzliya，专注于学士学位和授课型硕士课程）则拥有最大的犹太学生群体。旨在吸引两类学生且大量关注两类学生的大学可能会在制定全面的国际化战略时面临最大的挑战。新的国际学生计划会成功吗？在“研究型”和“非研究型”国际学生中是否会（进一步）专业化（和分离）？在这种情况下，这难道不是错过了在以色列连结和重新构想国际高等教育的机会吗？

意大利：人才流失还是人才环流？

Chantal Saint-Blancat

曾任意大利帕多瓦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Padua) 社会学副教授

电子邮件: chantal.saint-blancat@unipd.it

对于科学家来说，流动性是显而易见的，因为科研无国界。随着知识的全球化，近年来国际科学流动性显著增加。目前的欧洲可视为一个范例。在过去十年中，欧盟政策通过欧洲研究理事会 (the European Research Council) 管理的玛丽居里奖学金计划 (the Marie Curie Fellowship Scheme) 和其他科学补助，塑造且有力推动了科学和教育流动。然而，人才环流涉及激烈的竞争；在德国或英国等在科学研究上投入更多注意力和资源的国家，存在着“聪明人”越来越多的风险，这是以希腊、意大利或西班牙等其他国家为代价的。欧盟开放的劳动力市场很容易转变为人才流失/人才流入的局面。在这种背景下，意大利的案例尤其值得关注。最近的数据表明，意大利的科学家向外流动量很大，少有科学家回国，而且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意大利无法指望新进的外国科学家接替这些离开的科学家。

由帕多瓦大学资助并于 2013 年 9 月至 2015 年 7 月期间开展的研究结果显示了科学流动复杂性的相关结果，为现有的人才流失和人才环流理论增添了证据。该研究基于对在欧洲工作的意大利科学家 (数学家、工程师和物理学家) 进行的 83 次深入访谈以及向 2 420 名意大利科学家发送的网络问卷结果 (有 528 人回复)。本研究聚焦于解释意大利科学家选择出国的原因，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人没有回国；以及他们如何解读个人和

专业经历。研究样本在学科、性别和职业地位等方面都是均衡的。

回顾他们的职业轨迹

科学家流动的原因显然不受性别或学科的影响。大多数受访者不打算永久移民，他们只是抓住机会在别处做研究并积累经验，这有时是因为他们认为在意大利没有职业发展机会。大多数受访者在其职业生涯早期，也即很年轻的时候就搬到了国外 (平均而言，他们离开意大利时约 30 岁)。汇总分析他们的轨迹揭示了一些随机的过程而非理性决策的结果，他们愿意承担风险，甚至想法有些天真。

他们在国外找到的正是他们在国内辛苦寻找却没有遇到的：一个国家对科学和研究的欣赏，一个视博士学位代表着真正价值的社会，更好的科研和职业发展机会，更高的薪水、国际声誉、英才制度和公平的招聘制度。科学家们主要是在寻求认可。他们的成就对于其留在国外当然发挥了重要作用。几乎所有的受访者都表示，对于自己的科学能力在其他欧洲国家得到重视，以及在开发自己的项目时享有的更大的自主权，他们感到很欣慰。正如一位科学家所强调的那样，“找到工作是一回事，找到一份能使你 (作为研究人员) 的专业知识或是高学历受到赏识的工作又是另一回事。”

生活方式问题和原籍国的情况也是离职

的主要原因。科学的流动性不仅会对学术机构的运作方式带来质疑，也会对国家、福利制度和整个国家的社会产生质疑。当被问及如何定义人才流失时，多达90%的受访者强调他们的经历不适合这一归类。他们宁愿谈论“不对称的人才交换”，强调自己的祖国无法像德国自1954年以来所做的那样，或是中国最近的做法，将人才流失转化为人才环流。他们指出了将意大利的损失转化为资源的一些可能策略。

学术侨民的选择：机会错失？

在质性研究部分，接受访谈的所有科学家都认识到他们在意大利接受过优秀的科学训练。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继续与在意大利或国外进行研究的意大利人合作，“不是因为他们是意大利人，而是因为他们做得很好。”为了改善意大利高等教育体系，50%的受访者表示为外国科学家加入意大利学术体系提供激励措施将是最有效的策略。他们

表示，人才环流逻辑允许学术流动和协作的累积过程，这是在创新和科学国际化方面进行人才转换的完美环境。从这个角度来看，建立一个学术侨民知识网络，并招募海外的意大利科学家作为可以进行流动的社会资本调解员，从长远来看，这可能是一个比“回国”政策更好的解决方案。但学术侨民的调动不能被视为理所当然。

这项研究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是，移居海外的科学家认为，尽管他们是意大利非常重要的人力资源，但他们并不认为意大利将他们视为一种资源。正如其中一位受访者所说：“我们这些在国外居住的人代表什么？我们是一种独特的价值……因为我们是一种传感器，可以精确捕捉意大利境外发生的事情……为此，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进行人口普查。建立一个联系网络。而且，就个人而言，我在做任何可以回馈祖国的事情上都非常积极，这也是对于祖国培养我的一种报答……但我从来没有找到这样做的途径。”

欧洲的英语授课本科课程

Anna-Malin Sandstrom

欧洲国际教育协会 (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政策官员

电子邮箱: sandstrom@eaie.org

英语授课学士 (English-taught bachelor) 课程的显著增长引发了高等教育领域的争论。在荷兰, 目前正在进行关于英语学位课程对荷兰语和教育质量影响的公开辩论。一个游说团体 (未能成功) 将两所荷兰大学告上法庭, 因为这两所大学开展过多的英语学位课程。与荷兰语一样, 许多欧洲国家的当地语言往往没有在国内之外广泛使用。这导致高等教育机构越来越多地以非本地语言 (主要是英语) 提供学位课程, 作为其国际化努力的一部分。这种现象始于硕士项目, 但最近已扩展到学士项目。

本文基于对欧洲国际教育协会和求学之门 (StudyPortals) 名为“英语授课的学士课程——欧洲高等教育国际化”调查的结果分析 (2017年)。该研究探讨了英语授课的学士课程在欧洲的普及程度, 自视的利益和挑战以及预测中的未来。调查结果来自对求学之门数据库中 19 个欧洲国家高等教育机构提供的英语教学课程的分析, 并通过与高等教育机构和国家机构工作人员的访谈收集的定性数据作为补充, 访谈参与者来自捷克共和国、芬兰、德国、荷兰、波兰和西班牙。

欧洲英语授课的学士课程一览

在过去十年中, 欧洲英语授课学士课程的数量呈极速增长。受访者表示, 英语授课的学士课程不仅普及范围广, 且现在被视为高等教育机构一项深思熟虑的战略性国际化

活动。第二版“欧洲国际教育协会晴雨表: 欧洲国际化” (the EAIE Barometer: Internationalisation in Europe) 研究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 2 317 名受访者中有 33% 表示非本地语言课程是其院校国际化战略中的优先活动。

但是, 在对欧洲国家进行比较时, 学生可以获得的英语授课学士课程在数量上存在很大差异。在该研究所包括的国家中, 英语授课的学士课程数量最多的是土耳其 (545 个), 其次是荷兰 (317 个) 和西班牙 (241 个)。英语授课学士课程数量最少的国家是罗马尼亚 (32 个)、拉脱维亚 (39 个) 和奥地利 (59 个)。据报道, 英语授课学士课程最常见的学科是商学和管理学、社会科学以及工程和技术。

在比较按各国提供英语授课学士课程的院校数量时, 德国位居首位, 有 69 所高等教育提供该课程, 其次是荷兰 (42 所) 和法国 (41 所)。塞浦路斯 (10 所)、拉脱维亚 (9 所) 和罗马尼亚 (8 所) 是数量最少的国家。在观察每个国家提供英语授课学士课程的高等教育机构的百分比时, 会出现一些不同的情况。瑞士——几乎所有院校都提供此类课程——这是英语授课学士课程在高等教育领域最为普遍的国家, 其次是荷兰 (75% 的高等教育机构提供英语授课学士课程) 和丹麦 (70%)。罗马尼亚 (9%)、法国 (13%) 和波兰 (14%) 是拥有提供英语授课学士课程

的高等教育机构比例最低的国家。总体而言，英语授课学士课程似乎是较小的北欧或西欧国家中院校国际化的一个更常见的方面。

缺乏英语语言技能及招生上的挑战

引入英语授课的学士课程带来了特有的挑战。我们的研究表明，教职员工缺乏英语语言技能是一个主要障碍，一些受访者担心这可能会对教育质量产生不利影响。开发英语授课的学士课程的其他突出挑战（特别是在课程进行的第一年），与确定受学生欢迎的英语授课学士课程的学习领域，以及招收（不同群体）国际学生有关。在一些国家，国际学生录取因中等教育文凭认可有关的严格的国家规定而变得更加复杂。与整合国际学生和确保有效的国际课堂的相关问题也成为挑战。

英语授课学士课程作为国际化途径

尽管存在这些障碍，但受访的专业人士认为英语授课学士课程项目对其各自的院校产生了积极影响。英语授课学士课程带来了更多的国际化行政程序，更多的国际学生人数和多元化的课堂，以及更多的国际工作人员并提高了工作人员的英语技能。有些人还认为英语授课学士课程促进了国际化的主流化。因此，英语授课学士课程似乎对院校层面的国际化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可以看作是促进这一过程的一种机制。

英语授课学士课程带来的积极影响似乎也超出了院校本身。根据国家机构受访者的说法，英语授课的学士课程对院校和当地经

济都有经济利益，它们为国内国际化和吸引国际人才带来了更多的机会。一些国家机构工作人员还认为质量的提高也是开发英语授课学士课程的额外好处。然而，其他受访者，无论是在高等教育机构还是在国家机构工作的人，都担忧教育质量有可能下降，因为教学人员的语言技能不足，且以当地语言提供的高质量课程也被取消了。

英语授课学士课程乐观且需要谨慎对待的未来

总体而言，研究表明大多数研究参与者对院校和国家层面的英语授课学士课程都持积极态度。正如一位受访者所假设的那样，这可能部分是因为在大多数欧洲国家（不像荷兰），英语授课学士课程尚未达到临界质量，并且不被视为一个特别有争议的分析和讨论话题。受访者认为，他们的高等教育机构将在未来继续提供英语授课学士课程，并且这些项目的需求和供应将继续在全球范围内增加。与此同时，受访者认识到越来越需要对其英语授课学士课程产品进行战略性评估并确定利基项目。当这些项目成为教育领域更为常见的特征时，在未来，欧洲的英语授课学士课程可能会产生质和量上的变化，对这些项目价值的讨论可能也会增加。

本文的完整电子版链接为：
<https://www.eaie.org/our-resources/library/publication/E-book-series/english-taught-bachelors-programmes.html>

韩国的混合国际化：是否有发展前景？

李熙庆、李丙植

李熙庆：韩国延世大学（Yonsei University）教育系研究生

电子邮箱：hkleee2@yonsei.ac.kr

李丙植：延世大学高等教育学教授 全球高等教育中心（the Center for Global Higher Education）主任

电子邮箱：beyoung@yonsei.ac.kr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大量学生参与了跨境高等教育，大部分学生就读于主要的英语国家。但是，发展中国家的学生现正在寻找其他选项。通过向内国际化战略，如增加校园英语的使用，韩国已成为跨境高等教育的目的地国家之一。

最近，韩国高等教育机构见证了一种新的、快速发展的国际化模式，该模式结合了国际化的现有特征（以东道国的主要语言授课的典型留学模式），以及国际学生在不同学术课程中接受教育的长达十年的韩国国际化模式（配合最近开发的、基于需求的教育课程）。我们将这种组合称为基于需求的、以本土为导向的国际化混合模型，或简称为混合模型。尽管现在判断它有多好还为时尚早，但我们希望我们的评估能够帮助非英语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机构探索新的国际化战略。

近十年来韩国发展国际化的方式

为使其高等教育机构国际化，韩国一直致力于创建“英语友好型”的学习环境。高等教育机构已从精英机构招募外国教师，并建立了英语国际学院，如延世大学的安德伍德国际学院（Underwood International College）。用英语授课的课程数量继续增加。

例如，浦项科技大学（Poha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已成为一个双语校区，使用韩语和英语作为正式的学术和行政语言。

此外，自2005年以来，韩国政府一直通过“留学韩国项目”（the Study Korea Project）向即将入境的国际学生提供奖学金。它通过邀请来自英语发达国家的五所著名大学，如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和纽约州立大学（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到仁川自由经济区（the Incheon Free Economic Zone），创建了一个全球教育中心。这种国际化方法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十多年来，本科、国际学位生人数从2005年的9835人增加到2017年的45966人。

这个方法的瑕疵是什么？

尽管韩国国际学生入学人数空前增长，但由于三个原因，这一长达十年的战略似乎只取得了部分成功。首先，单独使用英语作为授课语言似乎并没有吸引即将到来的国际学生。他们大都来自亚洲国家，主要是中国，且不如那些在英语国家学习的学生那样对英语学习感兴趣。研究表明，很多人到韩国学习的原因是由于韩国文化和语言的吸引力。

其次，从长远来看性价比不高。由于这

种策略不能满足大多数国际学生的学术要求，韩国高等教育机构只能为这些学生提供有限的学术环境。因此，招募国际学生可能需要一个补充性的、有吸引力的奖学金计划，这对政府和参与中的高等教育机构而言都是成本高昂的。

第三，由于英语不是韩国的主要学术语言，韩国不能很好地展示其英语友好型环境。尽管有相当数量的学术教职人员在英语国家获得了最终学位，但也有在其他国家获得学位的教师。任何其他拥有财务和人力资源的国家都可以采用同样的策略。总体而言，它不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是需求驱动的、具有成本效益和竞争力。

近期发展：新兴的混合模型

最近，在韩国出现了一种新的国际化模式，我们建议将其称为“基于需求的、本土导向型混合模式”，或简称为混合型模式。例如，延世大学的全球领导学院(Global Leaders College)只接受没有韩国教育背景的学生。这些学生接受与大学里其他学生不同的课程。独特之处在于，该学院创建并教授学生想要学习的东西，即韩国文化和语言课程。

为什么混合模型更好呢？首先，它的性价比更高。由于国际学生既没有入学限制也没有学费上限，参与的高等教育机构可以向学生收取更多的学费并产生收入。节省成本也是有可能的，因为这些课程不再需要讲英语的教师。

其次，该模型确保了课程提供者和接收者的利益。通过提供适合学生学术需求的课程，如渐进式的韩语支持和“韩国语言和文化教育”(Korean Language and Culture Education)专业，全球领导学院认可并尊重国际学生选择在韩国学习的原因。教师不必

担心英语对教学质量的负面影响。事实上，这是任何希望利用其独特优势使其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国家的典范。

该模式可持续吗？

采用这种混合模式可以减少偏见，即非西方国家只有通过成功融入以英语交流的全球学术网络才能提升国家竞争力。采用这种模式也重视每个国家教育能力的长处和竞争优势。随着主要的英语国家反移民政策的兴起，英语的主导地位目前处于危险之中，利用韩国文化和语言作为资源既新颖又合适。

但这种模式是否可持续呢？也许如此。韩国文化继续呈现上升趋势，正如2018年平昌冬季奥运会(the PyeongChang 2018 Winter Olympics,)期间所展示的那样，开幕式和闭幕式在韩国流行音乐(K-pop)中活跃起来。但是，韩国文化和语言在多大程度上仍具有文化吸引力？同样重要的是这种策略的正确性，或者问题在于应该维持什么。这种混合模式并未解决现有的国际化问题，即学术资本主义，混合模式甚至会偏袒这个问题。高等教育机构应该满足国际学生的要求，这一说法听起来没什么问题，因为学生为此付费，但我们不应让国际化努力中以市场为导向的方法占上风。国际学生可能只是来消费教育服务，但即便如此，高等教育机构还有一项社会责任，即培养学生之间的跨文化和全球理解，特别是那些无法负担留学费用的学生；限制国际和本土学生互动的混合模式的特性则限制了这种互动机会。我们应该维持的不是流动性本身，而应是学生在流动性所带来的学术和社会环境变化中获得的经历。

迈向未来

毫无疑问，韩国已成为一个区域性教育

中心，因为它产出和传授有关韩国文化和语言的知识，这些知识是国际学生所要求的。虽然这一战略可能会为高等教育机构带来更多利润，但英语驱动的国际化战略仍然很重要，它们不仅为国内学生提供了宝贵的学习体验，且英语仍是当代学术语言。

为使混合模式变得可持续化，我们需要使其更具包容性，并帮助国际学生不仅在学

习期间感到满意，且还要在毕业后能够茁壮成长。学生们投入了金钱和时间，它们应该获得持久且有意义的收益。凭借获得的文凭，他们是否对文化差异有着更加包容的态度？展望未来，他们是否能够在工作和日常活动中持有这种态度？在充分解决这些局限性时，该模型可以作为非英语国家普遍流行的英语驱动国际化模式的补充。

国家政策与英语在高等教育中的作用

Xinyan Liu

美国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项目硕士生

电子邮箱: liupm@bc.edu.

随着全球化影响的不断深化,全球高等教育一直在积极应对高等教育机构的国际化。使用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EMI)是倡议之一。这部分归因于英语作为学术界在科研、出版和教学方面通用语的地位。

非英语社会中当地语言的地位对于引入英语作为知识生产的主要语言非常敏感,特别是在面临某种压迫形式的地区或国家。保护少数群体或主要国家群体的语言和文化可能会受到影响,具体取决于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政策的实施方式。我们无法从更广泛的国家语言政策中独立分析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的使用。许多非英语国家都有责任确保教育公平和可获得性,并为全球知识做出贡献,它们正面临着两难选择。

过去的研究和辩论主要集中在北欧国家,因为它们是最先引入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的国家之一。随着英语在全球范围内以无与伦比的动力和速度传播,至关重要是要更广泛地研究这种现象的影响。在本文中,我们通过纳入多个国家,包括巴西、法国、马来西亚、南非和西班牙等来扩大讨论范围。这里讨论的两个关键方面涉及目标国家关于高等教育语言的现行国家政策以及英语在各自高等教育系统中的作用。

本土语言 vs 英语

关于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的发展,一些主题在研究的五个国家中是一致的,但也存

在显著差异。由于大学负责为知识型劳动力市场培养劳动力,因此流利的英语提高了就业能力这一事实已成为高等教育机构的一个强大动力,特别是随着全球贸易关系和增加,就业能力也意味着流动性。在南非,精通英语的毕业生就业率较高。在马来西亚,学生认为英语熟练程度对于找工作或晋升至关重要。

虽然这可能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但研究发现在南非、马来西亚以及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地区维护使用当地语言具有相当大的价值。当地语言是重要的国家/区域团结标志,是获得公共服务职位所必需的。此外,良好地掌握母语有助于学习第二语言。

在这五个案例国家中,政府如何选择在国家教育体系中解决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的问题极大地影响了对语言、教育机会、公平和政策有效性的态度。南非在语言上是多元化的,政府宣称会推动有关多种语言的进步政策。然而,资源的缺乏以及该问题与种族主义的敏感联系是重大障碍。马来西亚有多民族人口,其中马来西亚语被广泛接受为一种统一的工具,但是,学习英语的人取决于社会阶层。法国有几种区域语言,法语为国家语言;现在的一个特殊挑战是许多移民语言的兴起,目前还不清楚政府将如何把多种语言制度化。在西班牙,少数民族语言在其使用区也有惊人的政治存在,人们正在努力适应英语。

这些社会现实影响着人们对语言的态度，这可能导致人们成功习得语言或是放弃学习这门语言。无论政策方向如何，如果个人不认同某种做法，那么试图执行政策将是无效的。例如，如果南非人认为南非荷兰语具有殖民内涵，或者加泰罗尼亚人认为卡斯提尔语（标准西班牙语）是他们不再认同的中央政府的象征，那么这些语言的地位可能会受到威胁。教育在促进多样化和教学包容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高等教育机构使用多种语言的做法可以成为更广泛社会的良好榜样。

高等教育中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的适用性

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的适用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高等教育的总体发展，政府能够提供多少资源，以及公众准备为学习投入多少。在五个案例国家中，西班牙和法国拥有成熟的高等教育体系。在欧盟范围内，它们作为发达国家的地位保证了金融安全和政治支持：当地语言非常普遍，引入英语是一项成功的尝试。巴西、马来西亚和南非的情况则有所不同。这些国家曾经是殖民地，这对国家经济发展现状产生影响。如果进一步推广英语的使用，那么当地语言及其带来的益

处可能会被边缘化。在南非和马来西亚，引入英语并非一项新政策。挣扎之处在于，整个系统是否接受广泛使用殖民语言所带来的潜在创伤包袱并将其视为当今世界不可或缺的工具，以牺牲本土化和回收曾失去的文化和秩序的努力为代价。

这三个国家也面临着不断加剧的社会不平等。特别是在巴西和马来西亚，公共系统中的外语教育不够充分，富人可以负担英语课程并在大学或就业市场取得成功。不平等是持续存在的。在南非，鉴于种族隔离的历史，阶级和种族之间的相互作用被放大了。

在引入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时，上述任何障碍都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此外，需要不断审视这一过程，并对其对高等教育和知识体系的潜在长期影响持批判态度。每个国家都有一套独特的历史和社会因素，这些因素在系统内对利益相关者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对这一主题进行全球比较研究以鼓励学习彼此的成功和失败具有重要意义。

注：本文基于国际大学协会（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ies）委托进行的同名研究，可发送邮件至 liupm@bc.edu 获取。

马来西亚的国家语言政策和毕业生就业能力

Viswanathan Selvaratnam

曾任区域高等教育与发展研究所 (the Regional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主任、世界银行高等教育专家

电子邮箱: selvaratnam432@gmail.com

马来西亚的公立、私立高等教育机构每年有超过 20 万人毕业。五分之一的毕业生仍然失业——这相当于该国青年人口的 35%。2012~2017 年的《全国毕业生就业能力蓝图》(The National Graduate Employability Blueprint) 强调, 超过 50% 的毕业生在学科知识、语言(特别是英语)、沟通和写作技巧及工作态度方面的能力低于标准。2013 年, JobStreet.com 调查指出, 70% 的雇主认为该国近年来毕业生的素质是平均水平且其英语水平很差。

高质量人力资本供需之间的不匹配阻碍了马来西亚实现其到 2020 年成为一个富有创造力、创新性、技术娴熟和以出口导向的高收入国家的愿望。马来西亚反对党联盟“希望联盟”(Pakatan Harapan) 政府已将该目标推迟至 2023 年。

马来西亚的高等教育

马来西亚的公立、私立高等教育的供给是政治驱使型的, 资金来源多样, 学生入学率种族两极化。公立教育得到大量补贴, 并以政治上坚定的、基于种族的平权运动战略为驱动, 以国家语言为教学媒介。自独立以来, 英语一直是公立学校的必修第二语言。然而, 在过去的四十年里, 较差的教学质量和实际使用情况使英语语言受到损害。这严重阻碍了学校为学生做好接受以英语为教学媒介语的高等教育课程的准备; 而以英语为教学媒介语可以使他们跟上新的全球知识的

加速增长, 并在快速变化的毕业生劳动力市场中竞争。

可预期的是, 以英语为教学媒介语的营利性、市场导向型教育提供者间的竞争将产出高质量的人力资本, 从而满足经济的技能需求。相反, 所有这些教育提供者都是资格证书和数量而非教育质量的驱动者。这些私立—公立教育提供者能否在强大的政治和经济动机的驱使下培养出高质量的人力资本以满足谙熟技术和知识驱动型经济的需求呢?

供需不匹配和失业率上升

公共和私营部门强烈抗议: 该国的大学正在教育英语语言能力不足和心智不成熟的毕业生, 发展其建设性思考的能力, 这种能力正是马来西亚工业和服务业雇主迫切需要的能力。随着对具有全球意识的熟练劳动力的需求增加, 许多顶级公司几乎只招收在海外顶尖大学求学归来的马来西亚毕业生, 而不是来自该国更为孤立的大学。

最近, 一位立法者指出, 除了他们的沟通、人际关系和领导技能之外, 成千上万的公立大学毕业生都在与私立院校的毕业生的竞争中失业, 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英语水平不佳。政府不得不将他们招募到高度膨胀的公共服务领域中。马来西亚东部沙捞越州的前首席部长, 已故的阿德南·萨特姆(Adenan Satem)重申: 数百名当地大学毕业生由于英语水平不佳而无法就业。为缓解“大学毕业生没有未来”的问题, 首席部长将英语设定

为沙捞越州的第二官方语言。

《国家毕业生就业能力蓝图》(*The National Graduate Employability Blueprint*)强调劳动力市场毕业生的供求不匹配,并着重指出就业率“仍然很差且未得到改善。”马来西亚雇主联合会(*the Malaysian Employers Federation*)也指出,毕业生失业是个严重的问题。人们指出英语水平较差是导致就业能力下降的主要原因。

为了促进就业,前巴里桑国家政府制定了《1 马来西亚培训计划》(*the 1 Malaysia Training Scheme*)和《毕业生就业能力管理计划》(*the Graduate Employability Management Scheme*)。令人困惑的是,尽管该国近6%的国内生产总值用于教育,但公立大学毕业生不得不(用纳税人的钱)接受再培训,而教育系统却无法纠正缺陷。

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和日常用语的下降趋势

新加坡在其各级教育层面保留了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旨在跟上快速发展的全球知识和市场体系的步伐。相反,马来西亚使马来西亚语成为抵消英语语言帝国主义的主要教学媒介语。然而,与韩国不同,它未能将马来西亚语变成科学学术的主要载体。

虽然自独立以来英语一直是必修的第二语言,但爱国情绪加上国家政治紧急情况 and

教学能力不足,逐渐导致马来西亚语的使用量增加,而过去四十年来,在毕业生、大学生和学术界中,以允许英语使用率大幅度降低。

大多数非英语国家都渴望与快速全球化的世界保持同步,这使得英语成为学校的第一外语。例如,在荷兰、中国和印度的学校,从小学就开始教授英语。在中国,对英语能力的需求正在激增,特别是在高等教育机构中。马来西亚的东盟邻国和竞争对手越南已将英语为媒介语的教育视为提高其快速发展的高等教育机构质量的关键。此外,越南表示,英语对于实现经济现代化和国际化的更大目标至关重要。2009年,印度国家知识委员会(*the Indian National Knowledge Commission*)强调,“对英语的理解和掌握是获得高等教育、就业机会和社会机会的最重要决定因素。没有经过充分英语培训的毕业生在高等教育领域一直处于障碍之中。“英语是在商业、金融、贸易、科技、科学等竞争激烈的领域确保社会流动和高薪就业的关键要求。英国文化协会(*the British Council*)认为,大约有17.5亿人在工作中讲英语,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

马来西亚努力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技术精湛、出口驱动型的国家,这取决于强化发展其人力资本。英语能力保证其能获得最新的科学发现和发展。

日本国际教师

黄福涛

日本广岛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教授

电子邮箱: futao@hiroshima-u.ac.jp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招聘国际教师已被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系统用作提高大学在全球排名中的地位和国际竞争力的有效策略。由于新的全球与国家背景因素,在工作角色及对东道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看法方面,国际教师的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日本也不例外。

与其他东亚国家不同,国际教师在日本的高等教育中具有历史性的作用。早在十九世纪末期,日本就邀请了来自英国、美国、德国和法国的大量外国专家、学者和专业人士,以建立一个基于西方模式的现代社会和高等教育体系。二战后,日本大学引入的美国通识教育理念要求这些大学聘请国际教师,特别是来自英语国家的教师,为日本学生提供外语课程。随后,1982年的《在国家与地方公立大学雇用外国全日制教师》(*Employing Foreign Full-time Faculty at National and Local Public Universities*)法案的实施使公立院校能够聘用全职和终身制国际教师,并允许他们在其所属院校参与行政事务。近年来,招聘国际教师也被用作提高日本高等教育质量和国际竞争力的有效途径。这些因素促成了日本大学国际教师人数的增加;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全职国际教师人数从1979年的940人(占全体教师总数的0.9%)增加到8262人(占全体教师总数的4.5%)。鉴于这一显著增长,基于对 Kazuhiro Kitamura 教授于1979年和作者于2017年进

行的全国调查结果的对比,本文分析了国际教师的个人和职业情况、他们到日本工作的动机以及他们对劳动力市场看法的变化。

在科学领域更多的亚洲教师和女性教师

就原籍国而言,1979年第一次调查显示,国际教师主要来自美国(39.1%),其次是英国(17.1%)、德国(15%)、西班牙(7.7%)、法国(6.6%)、中国(4.4%)和韩国(2.7%)。相比之下,2017年的第二次调查显示,国际教师主要来自中国(22.2%),其次是美国(18.8%)、韩国(13.2%)、英国(8.2%)、加拿大(4.8%)、德国(3.8%)、澳大利亚(2.8%)、法国(1.8%)和中国台湾(1.7%)。在性别方面,女教师人数从1979年的20.7%增加到2017年的26.4%。在学科方面,1979年,日本国际教师的学科领域主要是语言(33.4%),其次是语言和文学(26.1%)以及文学(17.4%)。2017年,虽然人文学科仍是外国教师最常见的所属学科领域(39.4%),但自然科学是第二大学科领域(25.5%),其次是社会科学(18.2%)和生命科学(7.3%)。至于学术职称,1979年,只教授语言课程的外国讲师人数最多(34.9%),其次是教授(23.7%)、讲师(15.8%)、副教授(14.7%),客座教授(9%)和助理教授(0.8%)。由于外国讲师人数迅速下降,2017年,国际教师中占比例最高的是教授(35.6%),其次是副

教授 (29.6%)、助理教授 (18.1%) 和讲师 (13.6%)。

动机和招聘

就这些教师前来日本的动机而言,在两次调查中,大多数受访者表示他们因学术或职业原因而被日本大学吸引(1979 年为 64.9%,2017 年为 78.9%),并且,一大部分且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他们喜爱日本生活和文化(1979 年为 31%,2017 年为 64.8%)。2017 年,大多数人表示他们决定在日本授课或做研究,因为那里的生活条件比在本国更好(37.7%,1979 年只有 1.9%),或是出于偶然(29.3%,1979 年为 14.9%),或是在本国找工作困难(21.2%,1979 年为 4.6%)。

在教师的招聘方式上也存在巨大差异。根据 1979 年的调查,大多数人通过私人关系(58.7%)、中间机构(16.1%)获得工作,或是通过公共或国际招聘广告直接向院校申请职位(8.5%)。相比之下,2017 年的数据显示,多达 64.7%的人直接向院校申请,其次是通过私人关系(30.5%)和通过中间机构(0.8%)。一方面,国际教师通过公共或国际

招聘广告进行职位申请变得更加顺利。另一方面,有证据表明日本学术市场对国际教师越来越开放,即接受国际教师的直接申请而不依赖个人网络。

受访者也支持这一点。例如,1979 年多达 71.7%的国际教师认为日本学术市场不对国际申请人开放,而在 2017 年的调查中,只有 37.4%的人持有此类观点。此外,他们在学术环境中似乎“更重要”。在 1979 年的调查中,近一半的受访者(47.5%)认为,日本教师总体而言对国际同事漠不关心,而 2017 年这一比例降至 36%。

结语

这两项调查表明,日本国际教师的概况、招聘途径和观念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与 30 年前相比,日本大学吸引了来自邻国更多的国际教师,且已更像是区域中心。此外,国际教师似乎正在发挥与当地教师相似的工作角色,而非像大多数人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那样主要从事语言教学。但是,他们来日本工作的动机没有发生太大变化。

日本和亚洲的国际预科证书课程

石仓佑季子

日本大阪大学 (Osaka University) 高等教育与入学研究中心 (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Global Admissions) 讲师

电子邮箱: ishikura@cheqa.osaka-u.ac.jp

国际预科证书课程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又称为 IB 课程) 提供国际认可的课程, 培养学生成为具有国际能力的个人, 以批判和独立地方式进行思考和行动。近年来, IB 课程在全球范围内经历了迅速扩张。根据国际文凭组织 IBO 的数据, 2012 年至 2017 年间, 全球 IB 课程项目的数量增加了 39.3%, 因为越来越多的教育系统认识到培育全球公民的价值。日本出现了这种趋势, 最近由于一系列政府举措, 日本提供 IB 课程学校扩大了规模。本文阐述了以日本经验视角观察到的 IB 课程扩张的全球趋势, 并探讨了这种转变给日本高等教育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2011 年, 日本政府宣布了一项野心勃勃的倡议——“200 个 IB 课程项目” (IB 200 Schools Project), 旨在未来五年内将提供 IB 文凭课程的学校数量增加到 200 个。IB 课程重视以探究为基础的学习和批判性思维, 符合政府长期的中学教育与高等教育目标, 即将本国的教学方法从知识型转变为以探究为基础的学习, 培养具有国际能力的公民。

日本的第一所 IB 学校成立于 1979 年。随后, 该国此类学校数量增长缓慢。在 2011 年新政府倡议公布之前, 只有 11 所提供 IB 课程的学校; 这些学校主要是国际学校, 其中 9 所是国际学校, 2 所是“第一款中学” (又称“一条校”, 此类学校必须遵循国家课程, 由政府指定教科书和规定时间表)。由于日本的国际学校数量有限, 因此需要更多的

第一款学校参与实现 200 所国际学校的目标。然而, IB 课程的教学语言为英语, 这成为了一个主要的阻碍因素。

为减轻语言负担, IB 课程是通过日本政府和国际文凭组织 IBO 的联合举措引入的, 在此过程中对略微修改了计划, 将项目的初始目标年推迟到 2018 年。虽然双语 IB 课程的推出支持了“200 个 IB 课程项目”, 但政府在 2016 年进一步修订了目标; 新目标旨在到 2020 年建立 200 所提供 IB 课程的学校, 包括小学项目和中学项目。截至 2018 年, 日本共有 58 所提供 IB 课程的学校 (包括小学、中学和文凭课程), 2011 年之前则只有 17 所。虽然日本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实现目标, 但其在短期内大幅增加 IB 课程学校的数量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

虽然目前的举措无疑正在推动日本走向变革, 但是从 IB 课程到日本大学的过度已经出现了挑战。自 1979 年以来, IB 课程已被日本政府正式认可为专科学历, 但许多教育系统并没有完全接受它。日本的一个关键问题在于, 根据学生的背景, IB 课程证书的认可方式不同。然而, 由于 IB 课程在日本的传播影响, 这种情况最近发生了变化。

IB 课程与日本院校之间的协调

私立大学引领了日本大学入学时承认 IB 证书的趋势, 而国立和公立大学则落后于此。因此, 当地大量的 IB 课程生申请和进入私立

大学甚至是海外大学就学。国立和公立大学为当地 IB 课程生提供了有限的入学途径：回国学生入学和定期入学。第一种方式针对的是在日本以外接受教育然后返回日本的侨民。第二种途径适用于没有任何海外经历的日本国民。这种定期入学途径要求所有学生参加全国考试。因此，IB 课程生需要参加 IB 课程期末考试和日本国家考试。这种双重考试是当地 IB 课程生选择申请本国私立大学或海外大学的主要原因。

IB 课程生要在国家考试中取得成功，他们需要进行完全不同于 IB 课程的期末考试准备。日本普通学校的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与 IB 课程首选的方法方式之间存在差距。日本的普通课程强调基于知识的学习，而 IB 课程则强调基于探究的学习和批判性思维。

为解决这个问题，国立大学开始为 IB 课程毕业生提供不需要双重测试的特殊入学途径。IB 课程的特殊入学途径常保留给那些以高水平日语完成 IB 课程的学生——学生需要达到日语 A 或 B 级才能在以日语授课的大学课程中学习。此外，大多数大学在 IB 课程招生轨道上设定了一个配额，在日语中被称为“若干名”。这个表达并非代表具体的数字，而是意味着只有少数学生能被录取。

大学通常会非常小心地开启新的入学途径，这可能会吸引那部分学校以前从未录取过的学生群体。大学录取在日本发挥着重要作用，因为日本文化要求大学有责任照顾好学生并确保他们在四年内完成学业。事实上，根据 2012 年的一项政府调查，日本大学的退学率很低——仅为 2.65%。为确保大学能够

实现这种社会契约，它们在选择学生上相当小心谨慎。

尽管大学可能会开设一个特殊的 IB 课程入学轨道，但人们对 IB 课程生是否能够适应日本大学教育环境的担忧日益增加。这已成为政府推动重新审视中等和高等教育教学方法的主要动力，这意味着将 IB 课程作为促进变革的工具。

展望未来

政府一直是日本教育改革的关键驱动力，它试图通过各种项目实现日本中等和高等教育的各种变化。“200 个 IB 课程学校项目”给当前的日本教育文化带来了许多挑战。然而，这些挑战可能成为日本转型的机会，这取决于如何处理对待这些挑战。

IB 课程被视为为大学做准备的课程项目。关于学生如何为大学教育做好准备的讨论很多，但很少有教育工作者讨论大学如何为学生做好准备。学生群体越来越多样化；当他们进入大学时，这些学生带来了不同的教学和学习期望。现在是时候让大学考虑如何改变其教育模式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学生群体了。

虽然本文特别关注 IB 课程学生，但这一论点可以很容易地应用于整个大学生群体。通过尝试更好地满足 IB 课程学生的需求，大学不仅可以增加国际学生和日本学生的满意度，还可以提升所有人的教育经验和成果。

本文基于的研究项目由 JSPS KAKENHI（基金编号：JP40762414）资助。

日本：为社会创新服务的世界一流大学 ——不要问你的国家可以为你做什么……

米泽彰纯

日本东北大学（Tohoku University）国际战略办公室教授、副主任

电子邮箱：akiyoshi.yonezawa.a4@tohoku.ac.jp

2017年，日本引入了新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政策。政府选择了86所国立大学中的6所作为“特定国立大学”（Designated National Universities），这些大学都有悠久的科研传统——这一名单包括东京大学（the University of Tokyo）、京都大学（Kyoto University）、东北大学（Tohoku University）、东京工业大学（the Tokyo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名古屋大学（Nagoya University）和大阪大学（Osaka University）。这些选定的院校被赋予了“杰出的”法律地位，不同于已经在国家政府资助方面具有显著优势的所有其他国立大学——它们与日本的90所当地公立大学和604所私立大学截然不同。政府对“特定国立大学”寄予厚望，它们将与全球领先的大学竞争。那么国家政府可以为它们做些什么呢？这些被选中的大学又应该做些什么呢？

并非首次尝试

这并非是日本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首次尝试。事实上，日本通过一系列政府项目和卓越计划积极参与世界一流大学政策而获得认可：例如，“21世纪卓越中心”（21 Century Centers of Excellence）（2002-2009），“全球卓越中心”（Global Centers of Excellence）（2007-2014），“留学生30万人计划”（Global 30）（2009-2015）和“全球顶尖大学”（Top

Global Universities）（2014年以后）。

与邻国中国、新加坡和韩国的新兴院校相比，日本的旗舰大学在过去二十年的排名中逐渐下滑。始终被强调的两个原因是：大学和整个社会国际化进程缓慢、金融投资短缺。虽然上述两项首个卓越中心项目是通过科研集群的直接投资来资助的，但影响并不显著，部分原因是日本大学的科学和技术基础设施已经在这些项目启动之前建立，即国家经济繁荣时期后的20世纪90年代。从2007年开始，“世界顶尖国际研究基地计划”（the World Premier International Research Centre Initiatives）仅针对少数几个集中投资的科研机构。现在评估这些举措对科研和大学以及对整个国家的实际影响还为时尚早。

由于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政策变化，“留学生30万人计划”最终支持了13所大学。“全球顶尖大学项目”现正支持这13所大学努力提高全球竞争力，另支持24所大学作为国际化的主要范例。这些项目不是对科研卓越的资助，而是通过关键绩效指标提升大学的国际化程度，如雇用国际科研人员和提高学生与教职员工的英语语言能力。

当“全球顶尖大学项目”于2014年启动时，政府宣布该政策的目标是推动10所日本大学跻身世界排名前100位。事实上，日本旗舰大学的概况是：例如国际学生和教职员

工的比例，在全球大学排名中很低，即便在现在仍然很落后。日本大学的国际化进程缓慢，这主要反映了整个教育体系和该国劳动力市场缓慢的国际化进程。

国家创新政策的核心

日本政府正在努力利用研究型大学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驱动力，并推动与工业创新相关的综合经济和金融政策。顶尖的研究型大学现在不仅吸引了教育、文化、科学和技术部门的关注，还吸引了诸如科学、技术和创新委员会（the Council for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以及经济和财政政策委员会（the Council on Economic and Fiscal Policy）等内阁办公室部门的关注。

与之前的卓越计划和国际化计划相比，“特定国立大学”的选择更多地侧重于院校设定愿景、计划和实施变革以使其能达到世界领先地位的能力。申请大学根据要求，须对自己的优势和劣势进行自我评估；根据良好实践和绩效评估的基准，对目标进行自我评估；对其实施顶尖研究和人力资源开发的战略进行自我评估；通过解决全球和国家挑战，对其经济和社会的贡献进行自我评估。该准则规定，大学的工作核心应包括获取和发展人力资源、改善科研能力和大学治理、加强财务基础、国际合作以及与更广泛社会的联系等。

问问自己你能为国家做些什么

“特定国立大学”项目审查委员会主席 Takeshi Sasaki 对日本顶尖研究型大学脆弱的财务基础表示担忧。他的愿望是看到公众支

持的上升和社会援助的显著增加，特别是来自于商业界和个人的捐赠，并得到政府的支持。

但实际上，新的“特定”状态并不能自动保证巨大的财务优势。与该项目直接相关的公共资金数额仅占大学运营成本的一小部分，约为其年收入的0.2%。相反，政府希望选定的大学更积极地参与非政府来源的创收，例如慈善捐赠和校企合作。根本的信息是，发展大学内部的管理能力是其实现世界一流地位的唯一可持续途径，且各院校要直接为国家知识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在这里，政府传达给大学的信息似乎是：“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问问你自己能为国家做些什么”——正如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在其1961年的就职演说中所说的那样。在这方面，该项目的提出和实施激发了关于大学如何建立并促进其发展与社会经济影响之间良性循环的系统性讨论。

与官方表达的愿景相反，内阁对该政策的支持似乎加强了政府对大学治理和管理的干预——通过产业关系并把教育与科研创新作为大学的核心功能，增加对经济发展的贡献。鉴于围绕将大学的长期知识活动与工业商业化联系起来的复杂机制的不确定性，这对斗志昂扬的世界一流大学的新挑战（即期望自我创收）似乎是一种冒险政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商业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位于美国的全球企业的支配。显而易见的是，大学将不得不奋斗并争取获得财政自主权，并最终确定其新的身份。

南非大学近期的危机

Jonathan Jansen、Cyrill Walters

Jonathan Jansen: 南非斯泰伦博斯大学 (Stellenbosch University) 杰出教育学教授

电子邮箱: jonathanjansen@sun.ac.za

Cyrill Walters: 斯泰伦博斯大学博士后研究员

电子邮箱: cyrillwalters@sun.ac.za

在 2015-2016 学年, 南非的大学经历了高等教育过去一世纪中最为紧张、最为暴力的学生抗议活动。大多数分析师将广泛的校园抗议活动归因于两个因素: 历史上白人大学的异化文化, 有关于标记为“#罗德必须倒下”(#RhodesMustFall, #RMF) 的运动; 以及高等教育的歧视性成本, 这引起了一场名为“#费用必须倒下”(#FeesMustFall, #FMF) 的运动。

“#罗德必须倒下”抗议活动于 2015 年 3 月在南非首屈一指的高等教育机构开普敦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Cape Town) 开始, 当时有一本科生通过将排泄物扔在十九世纪英国人的雕像上引发了一波抗议活动。这尊雕像是为了向殖民主义者塞西尔·约翰·罗德 (Cecil John Rhodes) 致敬, 他代表的是大英帝国的梦想、愿望和优越感, 而这导致了殖民地的剥夺和对非洲人的压迫。罗德是一位英国帝国主义者, 他获得了巨额的矿产财富并创造了罗德西亚殖民地。同样, 罗德为开普敦大学的创建以及东开普省的罗德大学提供资金。在“#罗德必须倒下”抗议者成功将罗德雕像从校园中移除之后, 该运动的需求进一步扩展到院校象征主义 (如艺术品)、聘用更多黑人教授, 以及所谓的“课程非殖民化”的转变。”

“#费用必须倒下运动”对高额学费的反抗于 2015 年 10 月在约翰内斯堡的另一家主要科研机构——南非金山大学 (University of the Witwatersrand) 开始。学生们反对不断增加的学费成本, 这限制了高等教育的获得率, 并使毕业生承担了相当大的债务。学生最终“赢得”胜利, 因为南非被围困、腐败和民粹主义的总统意外地宣布高等教育对贫困学生免费, 这是对两个官方委员会建议的反对。

学生反抗的代价

这两个以“倒下”为主题的抗议活动 (“罗德”和“费用”) 合并为了一个强大的学生运动, 给七所历史悠久的白人大学的转变带来了紧迫感, 并为贫困学生开放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特别是在八所历史悠久的黑人大学里。但抗议活动给南非院校造成了巨大损失。随着包括图书馆、计算机中心、学生宿舍和行政大楼在内的建筑物被点燃, 校园内火灾肆虐。损失预计高达 8 亿卢比到 20 亿卢比 (约合 5 500 万美元至 1.37 亿美元)。在几所大学里, 停课时间长达数周, 这带来教学的紧急安排和考试的严密安保。工作人员和学生因抗议活动的激烈程度而受到伤害, 其中包括时常中断的课程和大量身体恐吓, 以及警方和安全部队为控制骚乱而采取的行

动。

这一过程中出现了许多个人悲剧。一位副校长办公室的窗户上吊起了一枚汽油弹。一位顶尖医学教授的悲惨自杀引起了全国的关注，这位教授也是其健康科学系的第一位黑人院长，他的家人将其死亡归咎于参与抗议的学生带来个人创伤，抗议者占领了他的办公室并侮辱了他。在另一所大学，一名工人因学生在封闭空间内放置灭火器后发生哮喘而死亡。一名警察和一名警卫被困在学生放火的一个小房间内。在开普敦大学，一名警卫被人用一根铁棒严重殴打；一名抗议者从四楼扔下一块砖头造成另一名警卫颅骨骨折。

在主要的大学里，因海外大学的学生取消对南非校区的到访，国际合同和急需的收入白白丢失。包括副校长在内的知名学者退休或转移到国外大学就业。学者之间的关系，学术与管理之间关系，以及学生、学术人员和大学领导层之间的关系在这些暴力和长期抗议活动之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学术文化抗议的后果

毫无疑问，抗议活动提出了后种族隔离时期大学中的资金获取和种族包容等关键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抗议活动应被视为对社会的礼物，也是对难以改变的院校进行变革的迫切需要。但火灾还带来了什么损失呢？南非科学院（the Academy of Science of South Africa）发起了一个研讨会论坛，以讨论 2015~2016 抗议活动后校园文化的变化。从这些讨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所有的公立大学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历史悠久的黑人校园，暴力和破坏持续了一周又一周。在一些

历史悠久的白人校园，据报道有白人被排除在公共活动之外或被要求离开某些讲座。在某些情况下，艺术品遭到破坏和被覆盖起来，包括改革派和黑人艺术家的作品；这些行为敲响了大学校园悄悄出现的审查的警钟。讽刺的是，丹麦记者弗罗敏·罗斯（Flemming Rose）“被取消了”在开普敦大学的学术自由讲座（the Academic Freedom Lecture）；罗斯约 10 年前在丹麦出版了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这在当时引起了争议。在约翰内斯堡的一所大学，学术教学人员必须报告他们为“非殖民化”课程做了多少工作。

大学建筑物的物理损坏终将随着时间推移得到修复和重建。更难以应对的是抗议活动留下的心理和情感创伤。但 2015~2016 学生抗议运动更严重的后果包括在以下方面带来的长期威胁：大学作为自由表达思想的地方；作为在没有频繁且暴力中断的情况下进行教学、学习、科研与公共服务等学术职能的空间；作为开放、包容的知识交流论坛，而非受制于任何政治行动或流行趋势的意识形态的支配。

南非大学危机的更广泛影响

南非并非例外。最近的研究确定了曾经伟大的非洲大学灭亡的主要原因是政治干预、金融危机以及大学学术项目的长期中断。虽然自 2015~2016 抗议活动以来，大多数南非院校似乎进入了一个不稳定的时期，但该国 26 所公立大学是否能够重建社会知识和文化能力以使它们与其他类型的公共实体区别开来，这一点尚不清楚。

这些大规模的学生抗议活动也对南部非洲地区和整个非洲大陆产生直接影响。来自

南非以外的中产阶级非洲学生认为，后种族隔离时代的高等教育机构相对稳定，并通过当地的精英研究型大学提供比西欧或美国更近和更实惠的优质高等教育选择。同样，非

洲学者认为南非的顶尖大学是他们可以追求自己学术生涯的地方。由于 2015~2016 抗议运动，这种来自于非洲大陆的学术人才流入很可能也受到了威胁。时间将会证明一切。

南非的学生发展路径

Rebecca Schendel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教育学院 (the Institute of Education) 教育与
国际发展讲师

电子邮箱: r.schendel@ucl.ac.uk

世界各地, 人们都对高等教育系统寄予厚望; 个别家庭寄希望于大学学位所带来的有关社会流动的承诺, 而政府则期望大学毕业生的增加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回报。然而, 南非高等教育系统承担着额外的负担。在与种族隔离制度直接相关的几十年之后, 南非的高等教育机构现在预计将在社会的“转型”中发挥积极作用。在种族隔离结束近 25 年后, 南非的大学在转型议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人们现在要求各院校接收来自不同背景的学生, 并引入新的招聘和资助政策, 以改变高等教育系统在历史上的不公正性。

科研与实践之间的脱节

然而, 过去几年戏剧性的学生抗议突出了这一转型议程的局限性。南非高等教育体系仍然高度不平等, 白人学生在高等教育的入学率和成功方面的比例过高。这些抗议活动反映了学生们根深蒂固的挫败感, 他们认为, 尽管包容性言论已经存在多年, 但年轻的黑人仍然难以进入大学、完成大学学位, 并在毕业后获得充分的就业机会; 原因在于财务障碍和更具象征性的问题——如课程继续以牺牲当地知识为代价来保护欧洲思想, 从而与学生的实际情况格格不入。

令南非许多高等教育研究人员感到沮丧的是, 学生抗议者提出的问题都不是新问题。

事实上, 在过去二十年中, 所有这些都是学术分析的常用主题。广泛的研究尚未以令人满意地解决问题方式影响政策, 这一事实为所有相信高等教育研究对于阐明挑战并帮助制定更好前进方向的人们敲响了警钟。

通过协作探索科研空白

2015 年, 一群英国和南非的研究人员启动了一个合作项目, 旨在通过评估目前对南非高等教育的了解来缓解这一僵局。该项目基于三个基本前提: (1) 南非的高等教育应该为“公共利益”做出贡献, 且应通过使学生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来实现这一目标; (2) 尽管学生的个人经历构建了获得高等教育的“路径”, 但高等教育研究受到个别研究倾向于仅关注该路径中某个阶段趋势的限制 (即接受高等教育、高等教育中的经历、高等教育的成果); (3) 将这些大部分独立的文献汇集在一起是有价值的, 能更好地了解高等教育的不同路径如何适用于在不同院校学习的学生。由于这些定向概念, 项目团队选择不进行新的实证研究, 而是利用项目资金在三年内定期将研究参与者聚集在一起, 探讨我们目前对南非高等教育“服务于公共利益”的了解。

综合起来, 我们对现有文献的分析得出了三个主要结论, 其中两个结论与该项目对

学生路径的关注有关，另一个与我们对南非高等教育现有研究的最终综合分析有关。

从学生“发展路径”的角度思考

首先，当学生遇到阻碍他们取得成功的破坏性障碍和/或将他们推向可能被理解为公共“坏处”而非公共利益的未来时，分析有关学生“发展路径”方面的现有研究会为我们指明多个“问题”（除常见的入学机会外）。其次，将有关入学机会、经历和成果的研究结合在一起，有助于突出院校结构在整个高等教育中影响学生路径的方式。虽然每个学生接受高等教育（并在其中取得成功）的能力受其物质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但南非高等教育系统的高度差异性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南非大学仍然深受其历史遗产的影响，在使命和资金/资源方面存在巨大差异，这些院校差异对学生的路径产生深远影响，因为它们可以进一步加剧或帮助学生克服个人情况所带来的障碍。

对资源更充足院校的偏见

此外，该项目还指出了我们极度缺乏南非高等教育系统中处境较差大学的信息。项目中综述的文献绝大多数关注的是占据有利位置的院校，其中大多数是历史上的白人院校。在某种程度上，这并不奇怪，因为享有丰富资源院校中的研究人员可以更多地获得研究资金，并拥有更强大的网络，使其有更多的发表成果的机会，但它确实对我们理解整个系统的能力具有重要影响。例如，如果我们对历史上处于不利地位大学的院校文化知之甚少，那么，关于院校文化如何使在不

同类型院校中学习的黑人学生处于不利地位，我们又能探讨些什么呢？

结语

这些信息本身并不是革命性的，但它们在当前的话语中显然是不存在的，可能是因为它们只能通过对整个领域的分析而获得。然而，鉴于教师激励结构优先考虑个体实证研究而非综合现有工作的协作性尝试，这种分析很少见。这种趋势限制了我们为院校提供建议的能力，即如何在其整个高等教育学习过程中为学生提供最有效地支持。

总的来说，这些结论对那些有兴趣利用研究来加强南非未来高等教育政策和实践的人具有重要意义，但结论中也有国外高等教育研究人员对此问题的反思。就高等教育的排外历史而言，南非并不是唯一的存在；就苦苦改变高等教育中不平等的入学机会、经历和结果而言，南非也并非独一无二。南非的不寻常之处在于——在民族和解与转型议程中特别强调高等教育。因此，高等教育作为潜在变革空间的文献特别关注这一点。这一关注点为困扰所有不平等高等教育系统的问题提供了不同寻常的视角。世界其他国家可从南非的经验中获益良多。

注：本文内容代表了“路径”项目中的工作，这一合作项目将被发表为：《高等教育路径：南非本科教育与公共利益》(Higher Education Pathways: South African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and the Public Good) (由非洲思想出版社[African Minds]出版)。

